

自序

我對近代上海歷史發生興趣，可以追溯到三十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學唸研究院的時候。那時我醉心於中國近代史，但學不專純，好多務雜，而尤喜歡讀野史稗史。其後得王師德昭指導，才較為專心學習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並在此一範圍尋找碩士論文之研究題目。碩士研究兩年的成果，便是我的第一本學術著作《林樂知在華事業與〈萬國公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8）。林樂知（Young J. Allen）是十九世紀中葉由美國到中國去宣教的傳教士。他的大半生都在上海度過，主要是傳教、興學和辦報，也間接參與清末的洋務運動及百日維新，對中國近代思想的轉變及現代教育和出版業的發展與推廣有很大的貢獻。在本書中的一篇有關林氏創辦中西書院的文章，就是從當年的研究衍生出來的。

研究林樂知對我個人的學術之路影響甚深，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基督教在近代中國的歷史，另一方面就是上海研究。關於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相遇，以及其在近代中國歷史行程中所引起的一些重要課題，我寫過多篇文章討論和分析，收入《十字蓮花——基督教與中國歷史文化論集》（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4）一書中，已由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出版。至於上海研究，更成為我此後三十年努力耕耘、協助開發的一個學術範圍。

1970年代當我在美國加州大學做博士論文的時候，我便選擇了〈上海道台研究——轉變中社會之連繫人物〉作為題目進行深入的研究，師從徐中約教授。徐師是上海的寧波人，對上海舊事非常熟悉，偶有提及；其後隨他訪滬，他介紹我認識一些研究上海歷史的前輩，如上海社會科學院的唐振常先生，就是徐師當年的燕京大學同學。然而，其時中國大陸的上海研究隊伍尚未成形，資料也還沒有系統的搜集和整理，而且不對外開放，所以我當時為了研究上海，只能跑到加州大學柏克萊及洛杉磯校區的圖書館，以及遠赴英國倫敦的公共檔案館去尋找資料和翻閱文獻。

1970年代在美國和歐洲專業研究上海史的人也不多，故此我當時頗有道上孤單的感覺，沒想到二十年下來，上海研究竟會變成全球關注的一個學術熱點。如今在中國各地大學都有研究上海的專家，世界各地都有研究上海的學者，尤其是日本和美國，研究上海歷史、文化及經濟各個方面的都大有人在。其中因由，我在本書的第一篇文章〈從《上海通志》到《上海通史》——一個城市的史學史〉做了較詳細的分析。

本書內的其他各篇文章，多數是近幾年累積的研究成果，先後在不同的學術會議

及刊物上發表過，如上海的《史林》、台灣的《漢學研究》，以及美國的《清史問題》等，在此一一致謝。此外，〈上海道台與晚清政治社會〉一文，由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博士生陳同譯自我的英文專著《上海道台研究》(The Shanghai Taotai: Linkage Man in a Changing Society, 1843-90) (新加坡大學出版社及夏威夷大學出版社，1990) 的第二章，也謹此銘謝。

這些文章雖然在不同時期寫成，看起來好像沒有一個整體的系統，但實際上在這些論文的背後，我是有一個總體的構思的，那就是：以上海為代表的中國城市，在其走向現代的歷史行程及急劇遽變之中，傳統的「公共空間」也相應地出現了很大的變化。本書以「衙門」(以上海道台為中心的道署)、「會館／公所」、「局」、「堂」等作為考察的對象，分析新舊、中西、傳統與現代、本地及外來各種力量對這些「空間」帶來的變化，希望藉此對晚清時期中國近代城市的轉型有一個較為新鮮的看法。

最後，本書能夠出版，還要特別感謝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的金觀濤教授。本書能收入他主編的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專刊之一，實感榮幸。此外，李慧嫻、羅燕妮、葉子菁小姐幫忙校正及整理書稿，在此一併表示謝意。

梁元生
二〇〇八年